
日本对华大战略简析

——以“接触”与“防范”为核心概念

吴怀中

内容提要：中日复交后，日本对华大战略的核心概念由“接触”和“防范”构成，并经历了如下演变：在20世纪70~80年代意图通过接触使中国接受合作、推进改革开放并靠拢西方世界；冷战结束后，欲以“大接触”战略辅以战术性防范来引导中国接受西方标准并融入其国际体系；21世纪头十年，面对中国崛起，接触多舛、防范加剧，对华战略紊乱，中日关系由此波动；2010年之后，接触与防范围绕使崛起的中国“守规则、负责任”展开，对华战略重心向防范与体系之争倾斜。这预示着今后的中日关系可能面临更大的博弈和震动。

关键词：对华大战略 接触 防范 日美同盟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2)05-0065-16

国家战略，可以定义为实现国家核心利益的手段体系。在日本，冷战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安全、繁荣和价值被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目标基本成为主流趋势。^①在战略的层级上，日本的对华战略自然受其国家战略的规范和影响，总体上服务于上述国家战略的三大目标，实施目标的路径则分别可以对应为防范、趋利、接触。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简约，实际上在不同时期当然有不同的内容和侧重点。同时，战略高度的研究，被认为主要是指分析高阶意义上的政治和安全战略，即大战略

^① 例如，从2002年小泉内阁“对外关系工作组”报告到玄叶光一郎外相2012年1月在国会的外交方针演说，都指出安全、繁荣、价值是国家利益的三大目标。参见：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4/egnb_0124.html。此处的“价值”有时也被称为国家的“地位、尊严、存在感、荣誉、威信、品味”等，主要包括两大内涵：维护自由和民主主义等基本价值体系与秩序，提升日本国际地位包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等。

(grand strategy), 体现到对华大战略上, 实际就是日本以促好、防坏的手段来建构于己有利的日中关系总体架构的系统方略。^①

如此而言, 复交 40 年来的日本对华大战略的核心概念, 就可以归结为广义上的“接触”(engagement) 和“防范”(hedging) 两大元素。^②“接触”是通过增进与中国的交往和沟通, 影响和改变中国的思维及行为, 构筑稳定、协调、合作的双边关系, 并最终塑造有利于日本的日中关系——使中国接受、尊重或融入西方主导的自由民主主义的经济、安全和价值体系。“防范”则包含两个内涵: 一是防止中国发动对日本造成损害的扩张行为, 二是确保在该行为发生时日本有能力应对和反击。复交 40 年来的日本对华大战略, 内容当然不只是接触和防范两项, 但可以说是基本沿着这两条主线或其中的一条展开的。

一 历史的回顾与总结

无论是冷战两极格局, 还是冷战后的美国一超格局, 日本在对华大战略上都严重受制于日美同盟而不是国际体系的影响。复交 40 年来, 日本追随美国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基调的对华战略: 在复交的大约前 20 年, 以全面接触战略为主, 极少防范色彩, 两国关系基本以友好合作为主; 后 20 年左右, 则是接触加防范的战略, 接触时强时弱, 而防范则是不断走强, 两国关系阴晴不定。

(一) 20 世纪 70~80 年代前后的对华战略

这个阶段的日本对华大战略就是接触战略, 概而言之, 一是从美复

^① 经济贸易因素当然是考虑大战略时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由于全球化、经济客观规律、相互依存等因素, 除了政府投资和援助(如日本的战略性政府开发援助等)、地区合作推动(共同体、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中日韩自由贸易等)可以作为大战略研究的范畴外, 大部分的自发性商业经济活动很难被归类于国家战略的领域。当今日本政府即使充分强调要分享中国发展红利, 但也需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且, 冷战后, 中日两国贸易来往从小到大, 发展迅速, 基本没有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文化战略及软实力影响在当今世界日益重要, 日本在这方面也有可圈点之处, 但对于是否放在大战略中加以研究, 学术界至今尚有争论。

^② 之所以说广义, 是因为接触还包括对话、说服、协调、融合等概念, 防范则包括力量威慑、多边平衡、机制约束等概念。就日本来说, 中日复交后, 遏制应已不在其防范战略的选项之列。

交，战略联华、应对苏联，二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推动经贸往来，稳定政治关系，让中国靠拢和融入西方世界。^①

从1972年中日复交到70年代末期，日本对华“接触”的出发点在于现实主义均势战略，发展对华战略协调和合作关系、共同应对苏联威胁。其后，随着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和美苏进入“新冷战”，日本大平内阁决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经济合作（政府开发援助）等正面帮助。日本当时的主要战略考虑是：可以通过政治接触、经贸来往和经济援助等手段，使中国稳定而逐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促进中国与西方协调行动并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② 这一决策被誉为“日本摆脱‘战后处理外交’，为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主动采取的战略判断”^③。

这个阶段，日本对接触和改变中国、引导或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进入西方国际体系、保持良好的日中关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复交40年中，这个20年是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接触因素为最高、防范因素为最低的时期，可以说接触是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防范则因为阵营相同、力量悬殊而尚未进入政策选择的视野。这使日本将中国视为“友好伙伴”、为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奠定了基础。

这一趋势，即使在1989年冷战结束、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的最初几年（1989～1994），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其时，日本国力处于鼎盛期，而中国则处于风波后的“困难期”，日本对华有着相当宽裕的自信心理。“过去中国实力地位明显弱势时，西方强国对华关系中政治和战略的博弈性处于相对较低的程度”^④，是对这一局面的经典解释。当然，除此之外，日本主张国际“新秩序”、日美发生经济摩擦和同盟漂流、日中特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等因素，也是日本区别于其他多数西方国家主张继续积极采取接触战略的原因。为此，日本政府在西方发达国

① 日本学者国分良成也将这两点纳入“1972年体制”的内容。参见：国分良成『『1972年体制』を超えた日中関係を求めて』、『外交フォーラム』171号、2002年10月。

② 宫本雄二『これから、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日経新聞出版社、2011年、86頁。

③ 田中明彦『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112頁。

④ 崔立如《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若干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1期，第3页。

家集团反复主张不能让中国陷于孤立，并为此做出了实际努力。^① 这种接触战略，使中日两国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复交以来的最好历史状态之一。

（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对华战略

这个阶段，日本的对华大战略，是追随“一超”的美国，实施“大接触”并辅以“防范”，即“战略接触”与“战术防范”的战略，接触是基本面和主线，防范是副线，居于从属。日美欲以强势的接触来改变、塑造和融合中国，即所谓“日美在 90 年代对华采取了接触政策，政策目标不是将开始崛起的中国作为威胁，而是将中国诱导进国际体系”^②。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而中国发展势头看好，两国之间显现实际的矛盾和摩擦。日本在逐步重视中国市场潜力、保持对华积极认知的同时，也陆续出现了有关中国的“威胁论”^③、“对手论”和“不确定论”等的政策摇摆。不过，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对很弱，且正在迈向市场经济体制，日美虽然担忧中国将来有潜在风险，但仍然在总体上以强者的自信心态，认为从战略上可以实施接触政策，而且能够期待它取得成功。对于这一情况，日本学者国分良成 1996 年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对中国的评价还没有完全确定，——中国威胁论已经出现但还不是主流，日美期待中国被健全地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④

现实中，日本追随美国，对华实施战略的和全局的“接触”。克林顿政府从 1994 年后采取了“接触与扩大”的国家安全战略，即维持美国对世界的接触而不是军事遏制和排除，用综合手段扩大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国家共同体，说服和鼓励中国在意识形态、贸易、人权、军事透明度等方面接受西方标准。1996 年的《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由此强调“中国发挥正面和建设性的作用对地区安全和繁荣极为重要，为此

① 孫崎享『日米同盟の正体』、講談社、2009 年、249 頁。

② 王緝思・カーティス・国分良成編著『日米中トライアングル』、岩波書店、2010 年、31 頁。

③ 例如，日本《防卫白皮书》从 1996 年起开始正面“担心”中国的军力发展，此后这种倾向逐年加剧。

④ 国分良成「なぜいま日米中か—協調への課題と展望—」、国分良成編著『日本・アメリカ・中国』、TBSブリタニカ、2007 年、35 頁。

两国有意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合作。”^① 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宣布建立美中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步，日本与中国在1998年签署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第三份政治文件，呼吁面向亚太共同发挥作用。小渊首相的智囊机构“21世纪日本的构想”报告书还提出超越思想和认识差异，促进中日国民交流和构筑新型合作体制等“邻交”的建议。^② 其后，日本还在积极推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上发挥了作用。这些可以被视为当时的日本政府配合美国、促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正面信号。

当然，接触战略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影响中国，但是日本在现实中还是对不断发展的中国感到了某种不安。基于这种认识，日本逐步开启了对中国的军事戒备和防范心理，开始配合美国宣示防范政策，确保日美主导亚太安全秩序。因此，1996年的《日美安保共同宣言》、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等都含有不同程度的涉华部分。当然，由于总体上日（美）强中弱，日本仍以亚洲老大自居，所以这种防范更多是停留在战略规划和政策展示上——向中国发出了某种担心、警示和威慑的信号，而实际的军事部署基本没有同步跟进。

（三）21世纪头十年的对华战略

这个时期，大约是从小泉和布什保守政权诞生到金融危机发生、日美两国的民主党政权登台初期前后。该期国际格局的总体特点是一超多强，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日本紧跟美国。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总体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外交政策的主力集中于反恐战争，需要中国战略合作，同时对东亚地区外交的投入力不从心，稳华为上。二是从战略对手、合作伙伴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对华定位不断调整，但基本上对华政策仍体现的是如下目标：积极开拓中国大市场；力图把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以现行的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来约束中国，同时维持美军前沿存在、增强与地区盟国的

^① 「日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21世紀に向けての同盟—」、1996年4月17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sengen.html>。

^② 21世紀日本の構想懇談会（河合隼雄監修）『日本のフロンティアは日本のなかにある—自立と協治で築く新世紀—』、講談社、2000年。

联系，在安全领域加强对中国的制约和防范。相比与克林顿政府的“大接触”战略，布什对华战略中防范中国崛起的一面得到加强。

实际上，这也是日本对华大战略的某种放大版。只不过，美国忙于反恐，对东亚事务顾而不问，充当“甩手掌柜”，这就导致“二掌柜”的日本在面对日益强大的地缘政治“主顾”中国时，焦虑错乱，接触信心不抵防范意识，接触无方而防范有术，对华大战略的权重逐渐向后者倾斜，且多保守右倾指向。

这一时期，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小泉执政期，接触停顿，防范上升；二是安倍内阁到民主党上台初期，接触启动并恢复，但防范更甚。

小泉执政时期，中日陷于“政冷经热”，对华虽有接触但并无“接触战略”可言。这个局面未必是小泉精心设计的，但形成并陷入僵持后，小泉也就认为，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日本三分之一的中国，搞好日美同盟，加强防范，维持“经热”，在东亚合作及共同体建设上开展竞争并争取主导权，没有政治上的战略接触也行得通。这就是小泉没有对华战略的战略考虑。

然而，2006 年小泉下台前后，中国发展迅猛，影响日益壮大，“不接触”战略不符合中日美乃至地区合作等任何一方的利益，“接触”势在必行。这一迹象，其实在小泉执政的后期就已显现，2005 年 5 月“中日战略对话”启动，2006 年 5 月中日外长会晤，同意扩充战略对话、推动军事安全交流等四点措施。安倍上台后，调整对华战略，将中国作为其上任后的首访国，主动接触并建议与中国共同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福田则以亚洲共同文化作为接触工具，并与胡锦涛主席签署了中日第四份政治文件，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对国际社会担负共同责任作为对华外交的基轴。^① 日方有人对此认为，第四份政治文件中含有推动与中国的对话、合作以及促进中国改变的诸多内容，“通过这种各种对话改变中国的认识和思考方式是很重要的”^②。其后，麻生首相主办了独立于东盟峰会的第一届中日韩首脑峰会，鸠山则提出入

① 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日経新聞出版社、2011 年、438 頁。

② 北岡伸一『グローバルプレイヤーとしての日本』、NTT 出版、2010 年、184 頁。

亚亲美与东亚共同体的口号。^① 这些多少都带有接触战略的具体成分和因素。

从构建战略互惠的角度来看，日本是重视实施对华接触战略的。日本的温和派政策精英认为“不管日本采取何种政策，都无法阻止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起来。需要以此为前提来考虑对中政策。将中国进一步拉入国际框架，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也就是‘接触政策’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才是应对中国威胁论最好的方法。”^② 除此之外，日美在首脑会谈和战略磋商时，也总要向中国发出“接触”的信号，例如，2005年、2007年的日美“2+2”战略磋商一再表示将欢迎和推动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角色。

但是，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大战略本身，是处于心理纠结、具有两面特征的矛盾状态。日本决策层认为：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发展起来，政治上的竞争和压迫将会导致对日争夺地区主导权；经济上对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双方相互依存，日本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在安全上，中国的不确定系数和潜在威胁性却越来越大。对中日关系复杂的现实和前景，日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经常给出前后矛盾的答案^③，麻生外相和民主党代表前原诚司在2005年就公然声称中国是“威胁”，但后来又做种种解释，而日本政府总体上竭力维持着分裂的“经济机遇论”和“安全担忧论”。与此同时，从小泉到安倍、福田、麻生再到鸠山，日本外交经历了挟美制华、民主联盟、共鸣外交、价值观外交、东亚共同体等多种自我矛盾、缺乏连贯统一性的涉华战略构想。更何况安倍和麻生等右倾保守派一边声称推进战略互惠，一边还以“反华意识”来贩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私货，强调与中国

① 参见吴寄南《新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319页。

② 大江博『外交と国益』、NHKブックス、2007年、59頁。

③ 从2005年到2010年前后，日本著名智库出台了多份涉华政策报告。例如：PHP総合研究所『日本の対中総合戦略——「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としての中国」登場への期待と日本の方策』（2008年）、世界平和研究所『日中関係の新章』（2008年）、東京財団『北京五輪後の日中関係』（2008年）。这些报告都提出中国未来有多种前景。

的差异性和竞争性，打乱了日本构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大战略的机会。^①同时，他们还倾向于把“战略”和“互惠”分开，搞现代版的“政经分离”，从功利性和工具性的角度出发片面强调利益互惠关系。^②所以，即使在中日签署第四份政治文件的 2008 年，日本政府也决定彻底修改防卫大纲以便应对中国扩军^③，同时还终止了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这一有效的战略接触工具。

从 2010 年撞船事件对中日关系造成的巨大冲击可以看到，这一阶段，实际上“战略互惠”中的互惠走得很远，“战略”（互信、和解、地区合作及国际贡献）却并未能同步跟进。^④这与上面所述的日本在对华战略上的矛盾状态和失衡心理有关，当然也与其他外部因素有关。但不管怎样，此期日本对华战略中的“接触”政策，起码在政治安全层面上不能算做是一种很成功的表现。

相反，随着中国迅速而强势的崛起，日本政府在加强防范和保持威慑方面，却显得业绩不俗。2002 年小泉内阁的智囊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的报告就提出，日本外交战略的重点应转向应对中国的崛起，主张日本利用中国经济机遇和防范“中国威胁”的两手政策。^⑤日本 2004 年版《防卫计划大纲》首次点名中国，对中国的军力发展和海军活动等表示关注。2005 年随着驻日美军整编展开而举行的日美“2+2”战略磋商公然染指台海问题，日本的媒体同期更披露防卫厅制定“西南防御计划”、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夺岛演习”等消息。这种趋势一直延展到 2010 年新防卫大纲重点强调应对中国“威胁”、加强西南军事布防。^⑥其间，日本还推动构建日美澳印等多边安全合作网络、强调价值观外交

① 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の展開と課題—中国との関係を中心に—」、『国際問題』2010 年 1 月・2 月合併号、10 頁。

② 谷内正太郎『外交の戦略と志』、産経新聞出版社、2009 年、40～43 頁。

③ 「中国の台頭に対応、政府が『防衛大綱』抜本改革へ」、『読売新聞』2008 年 4 月 20 日。

④ 长岛昭久在 2011 年的看法更甚，他认为“‘战略互惠关系’这个词挺美，但中日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战略，也不互惠的关系。”参见：神保謙・長島昭久・林芳正「新たなパワー・バランスと日本の外交戦略」、<http://www.globis.jp/1938-6>。

⑤ 参见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710 页。

⑥ 之前，日本已在 2008 年将 F15 战机部署到冲绳基地，2010 年将驻冲绳的第一混成团扩编为第 15 旅团。

和民主国家联盟论，其中含有的防华因素世人皆知。由此，日本对华防范的步伐可谓不断加快和深化，日本的对华大战略已经产生相当程度的质变。

二 后危机时代的对华大战略

尽管日本的对华战略进入新世纪后一直都在调整，但2010年仍然可以被看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个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深度调整、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东亚的形势下，经过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乃至朝鲜半岛局势动荡）的发酵，不单是日本的新版防卫大纲和日美“2+2”磋商的战略文件得以催生，而且其政治和知识精英在很大程度上还改变并固化了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认识。这种认识的核心内容有两点：（1）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中日的综合国力对比正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日本一国无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问题；（2）中国显现出一定的不遵守、挑战或改变现存国际规则的霸权国家倾向，在安全方面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威胁可能性。其实，从2008年前后开始，这种论调在日本已部分登场，但撞船事件后，尤其是关于第二点，日本的主流精英、主流舆论和智库报告几乎集体转向，一致发表批评和谴责中国的言论。例如，北冈伸一表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那么容易期待的——中国试图用实力改变现状。”^① 前原诚司2011年在美国演讲时则声称“中国是要求改变现存国际游戏规则的‘挑战者’，主张的特异性和价值观的差异也是大问题。日美的最优先任务是从正面应对新兴的游戏挑战者以及构筑新的地区秩序，平时就要努力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这很是关键的。”^②

日本的政治精英及决策层认为，应对中国崛起的如此局面，需要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变局着眼，也需要借助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之机。他们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具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和忧患意识：（1）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动和挑战，以中国为首

① 北冈伸一『日本政治の崩壊』、中央公論新社、2012年、231頁、265頁。

② 『朝日新聞』2011年9月8日。

的新兴国家崛起，体系转型，权力转移，世界开始多极化；^①（2）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傍美难以解决所有问题，日本的实力和地位也在下降，但仍是拥有很多优势的世界大国^②，开展“战略外交”的必要和余地都比以前大。当然，日本的对华战略还与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关。美国全球战略重心高调“重返”亚太，其对华“再平衡”战略虽然总体上还是接触加防范的套路——强调全面接触中国，但明显地在通过展开“空海一体战”以及与盟友伙伴的广泛联合来加强对中国崛起及“反介入战略”等的防范和回击。^③同时，实力不足的美国准备在东亚实施战略后撤，而让日本在周边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同盟调整、格局变动和中国崛起的三合一形势，使后危机时代日本的对华大战略带上自主谋划的色彩，呈现出基本清晰的轮廓：利用中国崛起造成的全球冲击效应和反弹，借重和联合国际社会力量（不止美国）——对中国崛起关心和担心的西方国家和周边邻国，劝诱、鼓励和促推中国成为遵守现存国际体系规则的负责任的大国。同时，联合这些力量，运用文武手段，针对中国出现的破坏规则的行为进行施压、围堵、威慑和制约。归结为一句话，也就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联合地区和多边，设计和推动以一个“主流体系”和“联合网络”的力量优势来全面应对中国的崛起^④，通过这一大战略来防止东亚格局被“中华秩序”所主导，以确保中国的崛起进程整体上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可以看到，以上的“体系条件”与“同盟前提”，使得日本的对华战略——无论接触还是防范，除了带有一贯的同盟色彩外，还带上了与以往不同的“体系眼光”，即从自觉维护面临挑战的现存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前只要跟着美国就可以平白享受）的角度出发，

① 『外交青書 2011』、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1/html/chapter2/chapter2_01_00.html。

② 杨洁勉在《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3 期）一文中，将国际力量分为“四势群体”，即得势（中印等新兴国家）、守势（美国）、失势（欧盟及日本）、弱勢（部分发展中国家）。笔者认为，日本是否属于“失势”仍可商榷，总体上宜可归为守势群体。

③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port February 2010”，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

④ 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推动中日韩自贸合作等，也可算做其中一环。但如前所述，在此暂不作为大战略论述。

看待和处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问题。日本政治精英普遍认为，现存的西方国际体系是日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全局要素，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有动摇体系之虞，对日本的生存之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全局性外交战略课题是维持这个体系，“需要战略性地考虑如何容纳新兴国家的世界秩序”^①。比如，野田首相 2012 年 1 月在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表明，在构筑亚太地区的秩序和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日本外交的根本。^② 玄叶外相在演讲中论述如何实现安全、繁荣和价值这三大国家利益目标时，第一条就论述了要利用东盟峰会（EAS）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两大平台在亚太建立“民主主义的富裕而安定的秩序”以及“以国际法规则为基础的开放的多层机制网”。^③ 与此同时，日本的智库机构和知识精英也都纷纷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和建议。^④

新兴国家的核心是中国，上述秩序的维持及构建，关键因素就是如何处理中国崛起的问题。对此，野田首相在上述国会的演说中强调“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没有中国的建设性作用是无法描述的”^⑤，玄叶外相在演讲中也表示，对形成亚太秩序来说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对于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都很重要。为此，两国取得一致要推动广泛的合作。^⑥ 外务省的“战略家”兼原信克对此的解释更为直白——“能否将中国转变为对现存国际社会和亚太负责任的领导国家，是这个世纪日本外交的最大课题，也是日美同盟和民主国家全

① 2012 版『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2/pdf/pdfs/yousi.pdf>。

② 「第百八十回国会における野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noda/statement2/20120124siseihousin.html>。

③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4/egnb_0124.html。

④ PHP・日本のグランドストラテジー研究会編『日本の大戦略』、PHP 出版、2012 年、344 頁。野田内閣国家戦略会議「フロンティア分科会報告書について（概要）」、2012 年 7 月 6 日、http://www.npu.go.jp/policy/policy04/pdf/20120706/hokoku_gaiyo1.pdf。

⑤ 「第百八十回国会における野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noda/statement2/20120124siseihousin.html>。

⑥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4/egnb_0124.htm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2/pdf/pdfs/yousi.pdf>。

体的无法回避的课题”^①，“对此加以推动的，就是日本的接触政策”^②。

以上可以看到，后危机时代日本对华大战略的新特征是，不仅仅是像以前那样靠自身力量、靠日美同盟甚或靠危机前“日美 + X”的方式，而且开始从总体的“国际体系角度”，来考虑包括日中关系在内的对外战略。无论是接触还是防范，以维护体系、构筑体系、利用体系的形式展开，都以防止东亚体系变为“中国秩序”为核心。日本在大战略上越来越带有自觉意识地对中开展一场“体系之争”——如果把中日地缘竞争巧妙地转换为国际主流秩序 VS 中国另类秩序、维护现存主流秩序 VS 破坏这种秩序的对决，那么日本在面对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时就会立于不败之地。^③

由此，后危机时代日本对华的接触战略也产生了相应调整。首先，接触战略的目标值变了，不再强调要让中国单方面地融入国际体系，取而代之的是要求中国成为遵守国际规则和秩序的负责任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这表明，日本承认中国崛起并成为世界大国，20 世纪 80 ~ 90 年代以强对弱、单单把中国看做“被接触”国、寻求单方面改变中国的接触战略，已经得到了调整和改变。这一点，从近年日本《外交蓝皮书》的相关涉华表述也可以看到，例如从 2009 年到 2012 年，蓝皮书基本都强调了“负责任的作用”和“建设性贡献”或“符合国际规范”等措辞。^④ 日本学者田中明彦对此现状的表述是“在权力转移的长时段内，国际社会应该要求中国作为现状维持势力采取负责任的行动。”^⑤ 2011 年 5 月日美“2 + 2”会议的文件，也特别强调要推动中国遵守国际规范。

① 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日経新聞出版社、2011 年、361 頁。

② 谷内正太郎編『日本の外交と総合的安全保障』、ウェッジ、2011 年、84 頁。

③ 顺应时代流向、站在“主流秩序”一侧，日本就可以基本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日本很多精英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和经验。这些精英还认为，西方国际体系是日本繁荣和安全的宏观保障系统，如果东亚变成或回到中国主导的“中华秩序”，那么对日本来说是极为糟糕的事态。所以，在他们的眼里，现在的中日政治安全关系超越了双边层次，可以“被”作为体系之争。

④ 外務省『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9/html/h2/h2_01.htm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0/html/chapter0/chapter0_01.html#02。

⑤ 田中明彦「パワー・トランジションと国際政治の変容」、『国際問題』2011 年 9 月号、11 頁。田中甚至还暗示，美国在让渡权力上应该采取灵活的姿态。

其次，根据以上目标和环境，日本采取了如下对华接触战略：（1）系统方式，指在整个体系内，以日美同盟为背景，动员美欧等发达国家乃至其他国家的统一战线来实施“接触战略”，强化多重对话、交流和合作关系。“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着明显优势”，具有“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可维持国际优势的基础”，日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当然稔熟此理。^①（2）疏导方式，即借助利益融合和责任分担来引导中国，前者的典型象征是野田内阁同意推动中日韩 FTA 建设，后者是其主张中日美三边对话、共同构建亚太的秩序等。^②（3）堵压方式，可分为施压式和围堵式，是指批评或指责中国的规则违反行为，联手施加压力使中国遵守秩序。例如，2010 年以来，日本在地区合作机构和论坛主动提出海洋议题，鼓动相关势力联合施压中国。同时，民主党领导人的前原和野田等还提议建立“太平洋宪章”和“亚太制度”等体系平台来规范中国。^③（4）具体深入方式，除了强调落实战略互惠关系外，野田 2011 年 12 月访华时还主动发表“六点倡议”，包括“增进政治互信”、“提升互惠经济关系”、“增进国民相互理解”、“加强对地区和全球问题的对话及合作”等具体内容，其中，“中日高级事务级别海上磋商”和“日元与人民币的直接兑换”等新倡议已经实施。^④而在这之前，野田内阁已经决定购买中国国债，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野田还在上述国会演讲中再次声明，利用复交 40 周年之机，促进包括人员交流在内的各种对话和交流。

但是，如前所述，2010 年至今，中国被日本的主流媒体、智库报告和精英言论描绘为具有严重“破坏现状”、“挑战体系”倾向的新兴霸权国家，日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对能否通过接触政策改变经济军事全面崛起、日益强大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和怀疑。他们纷纷表示：

① 王缉思《世界政治变迁与中国对外战略思考》，载王缉思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年，第 10 页。

② 玄葉光一郎・中西寛「日米中対話のとき」、『外交』Vol. 11、都市出版、2012 年 1 月、15 頁。

③ 添谷芳秀承认这样的“接触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导致与中国的摩擦。参见：別所浩郎・伊藤隆敏・神谷万丈・添谷芳秀・山本吉宣「国際情勢の動向と日本の外交」、『国際問題』2011 年 1 月・2 月合併号、10 頁。

④ <http://www.kantei.go.jp/jp/noda/actions/201112/25china.html>.

“对华政策的基本是‘接触’，让中国向我们这边靠拢和融合。但对华实施‘接触政策’的时候，中国的军力怎么也有人担心。所以日本要战略性地构筑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加上其他民主国家的多边外交，来实施‘防范政策’。”^① 而民主党领导层则公开宣扬如下观点：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会，与中国要加强战略互惠关系，但中国军力发展太快而且不透明，日本需要认真采取包括西南防卫在内的各种措施加以防范。^②

“日本的对华政策，不是遏制，而是接触与防范的并用政策”^③，当今日本的精英主张这样的对华战略，但其言下之意实际是：接触不能缺少，目标伟大，但防范无论如何是必不可少的前提；防范是对华政策的基石，没有防范，结果难以预料，一切无从谈起，可能连最坏的结果都难以避免。不难发现，日本的对华大战略，已开始明显地向采取实际措施来防华的方向上倾斜和迈进，其防华战略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些措施中，除了利用一切可能的地区多边组织、论坛等实施“机制约束”、以“日本+X”和“日美+X”的形式组成多边安全网来制衡以外，以下的一些新动向尤其值得关注。

（一）针对中国深化和扩展同盟

2010 年以来，日美在防范中国的问题上达到高度的战略一致，日本利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对华“再平衡”，上下其手，从战略到战术，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防范大动作。首先，从体系角度来说，日本一再表明要支撑和协助美国维持世界和亚太霸权体系和主导地位。这从近年的一系列日本政要演说、日美政府联合声明或文件中都可见一斑，包括 2011 年 5 月的日美“2+2”会议声明、2012 年 5 月日美首脑会谈的联合声明，都确认日美共同维护地区秩序，同盟是亚太安定与繁荣的“基石”和“公共产品”。其次，2011 年 5 月日美举行的“2+2”会议，讨论具体深化日美同盟、推进防卫日本和周边事态计划的研究，强调导弹防御合作、联合维护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的安全，这被视为全方

① 别所浩郎·伊藤隆敏·神谷万丈·添谷芳秀·山本吉宣「国際情勢の動向と日本の外交」、『国際問題』2011 年 1 月・2 月合併号、10 頁。

② 玄葉外務大臣講演「これからの日本外交」、2012 年 5 月 28 日、<http://www3.nhk.or.jp/news/html/20120529/k10015440301000.html>。

③ 高原明生·渡部恒雄等『東京財団政策研究報告・今の中国を理解するための9つの視点』、2012 年 7 月、<http://www.tkfd.or.jp/admin/files/2012-03.pdf>。

位防范中国的信号。

(二) 联合与中国有矛盾的周边国家，平衡和牵制中国

近年来，民主党政要的足迹遍及缅甸、越南、老挝、蒙古、中亚国家、南亚国家，等于围绕中国实施了大回环式的外交活动。这其中，南海等海洋问题是日本最新开拓的远程防华战线，日本重点拉拢与中国存有争议的菲律宾和越南，并帮助他们增强防务装备和相关能力。

(三) 调整防卫政策重点和部署，构筑“动态防卫”态势，加强西南防卫

美国战略收缩，兵锋后撤，要求盟国及日本对本国周边的安全保障负起责任。日本政府文件表明“在美国进一步重视亚太过程中，作为日本，将主动地和美国协作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安全”^①。日本2010年版新防卫大纲提出要在其西南群岛加强军事部署，在西太平洋加强反潜、防空反导、警戒监视侦察（ISR）、指挥通讯、运输等能力。而民主党政权尤其是野田内阁，包括野田佳彦、前原诚司、玄叶光一郎、长岛昭久和森本敏等国防鹰派的当权者，认为这是可乘之机，正积极推动日美军事合作及责任分担，落实大纲并加强自主防卫能力建设。^② 这种举措，带有冷战时期日本替美国分担对苏作战任务的意味，会对中日安全关系带来直接的影响。

三 结语：对华大战略的走向

“接触”、“防范”是考察日本对华大战略的关键概念和线索。从上文可以看到，复交后的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对华大战略是“接触战略”的“单人舞”：日美对中国实施战略接触与联合，共同应对苏联威胁，80年代在此基础之上还加入了日本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国靠拢和融入西方阵营的战略意图。“防范”还没有角色安排。这一大战略的现实基础之一是日本（美国）对于中国的实力差距和优越心理。

① 『外交青書2012』、<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2/pdf/pdfs/yousi.pdf>。

② 森本敏「米国のアジア重視政策と日米同盟」、『国際問題』2012年3月号、42~43頁。

这一模式，基本延续到 90 年代的前期。其间，中日保持了友好合作的关系。从 90 年代中期前后开始，面对发展提速、开始崛起的中国，日本在安全上始具“担心”，联军展开了一些战略安排和政策宣示，但总体上因具有以强对弱的实力优势，所以此期的对华大战略是带上防范色彩的美式“接触与扩展”大战略的日本版——期待并推动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其间，中日政治安全关系多晴带阴。但是，进入 21 世纪后，中日政治安全关系来回震荡，阴晴不定，有时还是阴云密布。从中可以看到的一条很清楚的线索是：面对日益发展和崛起的中国，再加上结构矛盾和利益摩擦，日本的对华大战略，防范的一面延续了 90 年代中期后的走向，经过两次防卫大纲的出台以及多次日美战略磋商，强化并敲定了连接全球及地区、紧盯海洋前沿的访华态势和举措，线索连贯并走势清晰。但是，接触的一面，也就是寻求对华稳定、协调、合作与融合的一面，却无法对接中国强势崛起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全面磨合，在定位、目标和举措上陷入混乱和矛盾，中日政治关系由此经历了政冷、战略互惠重启、微温、再冷、低温难热的颠簸怪圈。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日本对华战略，经过 2010 年前后的内外一系列事件的促发，基本形成了这样的架构和趋向：综合强化并重点夯实防范举措，在此基础上，运用多重全面的接触战略——尤其是在日美同盟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和多边组网的结构力量，使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并遵守现存的国际秩序。这一战略的认识前提是，日本承认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但不认为自己在体系结构中处于很大的劣势，同时研判这样的中国很可能对日本造成威胁或风险。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日本的对华战略将具有更多的体系较量、多边博弈、对峙抗衡的取向，将会给处于“复杂的调整过渡期”^①的中日关系带来不安因素。

(责任编辑：李璇夏)

^① 唐家璇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讨会的基调演讲——《继往开来，共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945274.htm>。

太郎と日本政府は「島の購買」を以って、その「主権領有」を明らかに示そうと企てているが、このような「島濯ぎ」という陰謀は必ず失敗する。釣魚島問題は国家の核心利益に関わっている重大な関心を寄せる問題であるから、中国は断固とした対応策をとることによって、既にわりとよい効果が収められた。今後、中国は、各種類の力を弛まずに強めて、主動権を取って、一日も早く釣魚島問題を解決して、中日関係の更なる飛躍的な発展をなすとげさせるよう努力すべきである。

国交正常化 40 周年：中日関係 のなかのアメリカ要素

馮 昭奎

中日国交正常化以来、二国関係のなかの「アメリカ要素」の本質は、米日不平等が中日関係に対する影響である。2010 年のアメリカの「アジア回帰」は、もともとアジアの国である日本の「アジア回帰」を阻害している。釣魚島問題は、1971 年にアメリカが沖縄返還の際、中日間に仕掛けた「地雷」である。国交正常化 40 年間の一つ重要な教訓は、中日両国が共同で平和的にその「地雷」を排除することであり、それと同時に、「雙管齊下」は中日の間に各種の矛盾と問題を解決する有効な方法である。

日本の対中国大戦略への一試論

— 「関与」と「ヘッジ」をキーワードに —

吳 懷中

中日国交正常化以来、日本の対中国大戦略はそのキー・コンセプトが関与とヘッジからなっており、以下のような変貌コースを辿ってきた。即ち、1970～1980 年代においては、関与政策によって中国を対ソ封じ込めの協力へ誘い、近代化支援による西側世界へのシフトを図った。冷戦終焉後は、戦略的関与と戦術的ヘッジによって中国を西側主導のスタンダードやシステムへの受容・参入に導き出そうとした。21 世紀に入ってから、中国の台頭に対し、関与の難航やヘッジの展開が日中関係に不安定をもたらしていた。そして節目としての 2010 年から関与とヘッジは既に台頭した中国を如何にルール遵守と責任のある大国へ変容させるかに収斂されているが、ヘッジのほうが政策としてむしろ目だっ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これによって、これからの中日関係はより大きな圧力と軋轢に臨んでいく可能性が出てくるだろう。